

【齐鲁名人】

何思源：
书生从政的往事

□林建刚



何思源，山东菏泽人，常自称“曹州府人”。在曹州府，何家可谓大家族，何思源祖上曾出过多位进士，先祖何尔健是明万历己丑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何应瑞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何颀是康熙七年的进士，之后，虽少有仕进，尤其到了何思源父亲一代，家道中落，但仍书香不绝。

自古以来，山东有很多这样的大家族驰名内外，最有名的自然是孔氏家族，传承千年。晚清民国时期，这些大家族中还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比如，聊城的傅氏家族出了傅斯年，菏泽的何氏家族出了何思源。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何思源与傅斯年有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山东人，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都考入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傅斯年入读的是国文系，何思源进的是哲学系。他们都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毕业后，也都去欧美留学。

两人人生的岔路，体现在两人对从政的态度上。傅斯年毕竟是书生，立志于学术研究。而何思源则在留学归来短暂的教书生涯之后，很快进入了政界。但是，留学9年的何思源，在从政的道路上，依旧不改书生本色，他最关注的还是山东的教育事业。

1928年，受蒋介石的赏识，何思源成为山东教育厅厅长。这是何思源任职最久的一个职位，也是他最有功绩的时期。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何思源极大地推动了山东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时的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是军人出身，最重视的还是军费。何思源多次跟他交涉，硬是要求他一定保证山东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何思源的据理力争下，韩复榘向他表态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除此之外，国立青岛大学的创办也与何思源息息相关。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何思源让他的北大同学杨振声做了青岛大学校长（在北大时期，他们就曾在办学生刊物《新潮》时合作过），让赵太侗做了教务长。这两人也都是山东人，杨振声是山东蓬莱人，赵太侗是山东青州人。在杨振声与赵太侗的网罗下，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等人都来到青岛大学教书，青岛大学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大学。

在任期间，何思源还竭力保证各大学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1929年，山东曲阜省立

第二师范演出了《子见南子》的独幕剧。这让孔氏家族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该剧玷污了孔圣人的形象，向南京国民政府控告校长宋还吾，要求禁演该剧。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经过何思源的斡旋，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场争论背后，其实蕴含着学术自由与学术专制的较量。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何思源，站在了学术自由的这一边。与这件事异曲同工的还有他保护胡也频、丁玲夫妇的往事。

上世纪30年代，胡也频来到山东省立高中担任国文教师。教学期间，胡也频大力宣传现代文学、普罗文学，鼓吹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很多青年学生，季羨林当时就是胡也频的学生。很快，胡也频的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党部的注意，此事惊动了韩复榘。韩复榘原本打算逮捕胡也频，但在何思源的劝说下，最终放弃了这一行动。何思源的这一行为，让人想起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教育之外，何思源也致力于山东农村的乡村建设。在他的帮助下，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多次来到山东，梁漱溟以山东邹平为据点，展开了乡村建设运动。

“七七事变”的爆发打乱了何思源建设山东的美好梦想。他必须起来与日寇斗争。抗战期间，何思源的老同学罗家伦曾概括出抗战的一个奇特现象：“武人没有降将，文人偏有汉奸。”罗家伦的概括很深刻，但也有例外。至少，山东的抗战情形与罗家伦概括的恰好相反。

当时，作为军人的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面对日寇的进攻，一退再退，成了“逃跑将军”，最后被蒋介石军法从事，枪毙了之。与韩复榘相反，此时，作为一介书生的何思源却投笔从戎，拿起枪跟日寇在山东打起了游击战。在这一时期，为了逼迫何思源投降，日寇还绑架了何思源的夫人与孩子，来诱降



▲何思源与家人合影



▲何思源与妻子何宜文

何思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最终，何思源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日寇释放了自己的妻子与孩子。

抗战胜利后，何思源做了北平市长。在此期间，面对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何思源在军队与学生之间左支右绌，但他是有底线的，那就是：坚决不能让学生流血牺牲。这一时期的何思源，还曾跟胡适一起合作，全力保护北大学生的人身安全。

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大员的何思源，在国民政府与新政权之间，选择了新政权。他不仅选择留在内地，而且还劝傅作义和平起义，保全了古都北平。

何思源的这一抉择，或许与他经济制度与国家的认知有关。在留学时代，何思源一直主张计划经济，而苏联正是计划经济的典范，这让何思源对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抱有期待。何思源在《回忆我的一生》中说：“我在美国上了三年大学，自感一事无成。1922年转赴欧洲，先到德国学习。在德国三年，学习经济和政治。我觉得美国的自由经济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他们的思想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家没有政策和计划，而德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干预较多，人民也有服从国家管理的习惯。我对经济政策和计划问题发生兴趣，想写一本书。”后来，何思源真的写了一本《经济统制论》，鼓吹计划经济。

除此之外，何思源一直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他认为：“自由是民族之自由，不是个人之自由。”何思源的这种对国家的认知，与胡适的主张截然对立。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胡适写道：“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何思源主张“舍己为国”，最终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而胡适则主张“哪里有自由，哪里才是我的祖国”，最终，胡适选择了离开中国，远赴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源多次担任政协委员，还翻译了许多名著，并多次对台湾民众广播，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奔走。1982年，何思源在北京逝世。他前半生从政，但念兹在兹的还是教育、读书；后半生做翻译，在消遣岁月的同时，未免将家事国事天下事埋在了故纸堆中。稍显讽刺的是，在读书上，何思源的判断力未免有些偏差，他对计划经济的迷恋，未免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毕竟，回首我们过去的灾难，我们的贫穷与落后，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计划经济的迷恋与追求。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有媒体称，国资委要求民航、金融、电信等行业在“十一”前关闭设在机场、火车站等重要交通枢纽的贵宾厅。

一般说来，机场贵宾厅里的贵宾多是头等舱乘客。那么，什么人可以享用头等舱和进入贵宾厅呢？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关于重要旅客乘坐民航航班运输服务工作的规定》，仅限于省部级正副职且须是因公出行。

我不是公务员，无所谓行政级别。作为大学教员亦不兼行政职务。一句话，平头百姓。不过非我虚构或出于文学想象，现实生活中我还真利用过一次机场贵宾厅和贵宾通道。

【窥海斋】

贵宾厅里的“遭遇”

□林少华

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应邀赴岭南一所大学讲学。那所大学的校长是副部级还是正厅级我没确认，反正他贵为“贵宾”。也许因为他听说我的演讲颇受好评或是出于礼贤下士，百忙之中特意从市里逃会出来为我正式颁发客座教授证书，完了还吩咐办公室人员务必用他的贵宾卡把我送去机场。到了机场，我俨然校长大人，由一位略带岭南口音的礼宾女孩毕恭毕敬又训练有素地让我入贵宾厅。玉米发糕般厚墩墩的地毯，榕树根般的枝形吊灯，墙上仿制的蒙娜丽莎名画，足可坐一人的宽大单座沙发。不坏，的确不坏，是比大厅硬邦邦的网眼不锈钢靠背椅舒服多了。何况，没有小儿在身旁不屈不挠的哭叫，没有美女在眼前搔首弄姿的干扰，没有避让往来拖运行李箱的礼貌要求。这么着，正当我架着二郎腿准备分析蒙娜丽莎嘴角笑意的学术意味时，一身旗袍的礼宾女孩端着茶盘茶杯送茶来了。我以为她放在茶几即转身离去，不料她居然俯身屈膝，单腿跪下。我条件反射地即刻立起：“姑娘，别，别别，使不得，使不得的……”我一时狼狈不堪，语无伦次。

结果，蒙娜丽莎的微笑顾不得了，上好的琥珀色茶汤也没品出什么滋味。如此惊魂未定之间，礼仪女孩又一次带着蒙娜丽莎的微笑款款走来，把我直接领上飞机。幸亏登机手续，安检手续全免，否则非丢了身份证或忘了手机不可。可问题是，作为乘客，这果真是正确而自然的状态么？我面对空无一人的机舱暗自思索，直到众人吵吵嚷嚷涌进来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罢了罢了，还是这样当普通乘客好，还是混迹于普通男女中间心释怀然。贵宾当不得的。当贵宾有啥子好哟，在贵宾室里一个人，进机舱时一个人，旗倒兵散，众叛亲离，孤家寡人！虽说我性喜孤独，但终究是独自面对落日余晖的孤独、独自仰望夜空流星的孤独、独自倾听野蛙鸣的孤独……因而那是不具排他性的孤独，是有文学情思或一缕乡愁相伴的孤独。

我蓦然心想，那些时常享受贵宾待遇即货真价实的贵宾们会有何感受呢？我想他们大概会之泰然，甚或认为天经地义亦未可知，至少不会像我这样受宠若惊大失常态。是因为自己是初次吗？这肯定是原因，但不仅仅如此。对了，记得若干年前去外省开会。会后晚宴，宴罢一行人出门时，主人提议去洗脚馆来个药物足浴放松一下。说实话，我觉得怪别扭的，不想去，但碍于场合，只好尾随。进门仰面躺倒，不久一位姑娘用木盆端着大半盆热水“呼味呼味”走来，半蹲半跪地将我的脚泡在一股中草药味的水里甚至抱在怀里揉搓……忽然间，我想起在小镇沿街卖发糕的妹妹，想起当年在乡下务农时邻院的村姑，想起一个早婚早逝的不幸的堂妹。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眼角隐约有发热。随即翻身坐起，昏昏沉沉走到门厅静等同伴们出来。都说足浴后好睡觉，可我那天晚上反而没睡好。那是我第一次进洗脚馆，肯定也是最后一次。洗脚馆作为服务业自有其存在的理由，我无意否定。我只是出于纯粹个人性理由不想去，去了受不了。

我不是要标榜自己多么高尚，多么具有悲悯情怀和平民意识。我只是受不了。我不想伺候人，也不想被人伺候，如此而已。而另一方面，上课和演讲当中我又一再告诉学生、告诉年轻人要有精英意识——一个没有精英、没有精神贵族的民族，哪怕再有票子房子车子，也是永远站不起来的民族。同时我也强调，精英绝不属于北大钱理群教授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绝不意味着可以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为个人捞取好处，而意味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弱势群体合理争取更多的流动空间。

说起精英、贵族，上个星期上海一位著名学者也跟我提起这两个词。他不胜感慨地讲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位所谓明星知识精英的表现：外出活动时如何不肯和大家坐一辆车、整个行程如何不说一句话、如何对随行人员颐指气使……“毕竟是老师，身为老师怎么可以那样呢？”我禁不住问：那人可姓爱新觉罗？老先生回答：不姓罗，更不姓爱新觉罗。北师大启功先生其实是姓爱新觉罗的，可你看人家，那么大成就，却那么平和，一点儿架子都没有。那才叫贵族，才叫精英，才叫精神贵族！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